

## 生态女性主义视阈下的《钟形罩》

赖 艳

**内容提要:**目前对美国女作家西尔维娅·普拉斯的小说《钟形罩》的解读主要集中在女性成长主题、死亡重生意象、疯癫等方面。本文则认为该小说反映了一定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通过对作品中自然意象的分析,可以发现女性与自然的天然亲密及共通之处,及女主人公藉此对父权社会的反抗。此外,女主人公埃斯特对直觉及生命多样性的强调与依赖也表现了对男性及抽象科学所代表的理性的谴责。

**关键词:**《钟形罩》 生态女性主义 自然意象 直觉 多样性

**作者简介:**赖艳,华中师范大学英语系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Title:** A Study of *The Bell Ja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Feminism

**Abstract:** Presently critical reviews of *The Bell Jar* by the contemporary American woman writer Sylvia Plath have mainly centered around the book as a woman's initiation novel, the images of death, rebirth or divided selves, and Esther the heroine's lunacy. However, this essay attempts to prove that this novel reveals some idea which can be regarded in line with the later ecofeminist thoughts. A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nature images existing in the narrative and description of Esther helps to disclose the affinity between women and nature, and how Esther have used it to defy the patriarchal society. Besides, Esther's instinctive dependence on intuition and insistence on variety also demonstrates her condemnation of the so-called reason which gives power to the ruling male and the modern scientif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The Bell Jar* ecofeminism nature images intuition variety

**Author:** **Lai Yan** is a lecturer in the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Her major academic interest is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cathy-lai@163.com

《钟形罩》是美国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发表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以自传体的形式讲述了史密斯学院大三女生埃斯特·格林伍德从精神崩溃,多次尝试自杀,到获救送入疯人院,最后康复出院的整个过程。小说取材自作者本人大学时代1953年夏至1954年初因自杀未遂而进入疯人院治疗的经历。更具传奇性的是小说出版后两个月普拉斯就打开煤气自杀死去,且此举动与其丈夫英国著名诗人塔特·休斯的婚变不无关联。因此,对《钟形罩》的解读常常超越对小说艺术成就的评价,而成为对女作家普拉斯生活及诗歌艺术的一个注脚。

由于作者的女性身份及其遭遇,以及小说中女性面临的困境,对《钟形罩》的评论绝大多数围绕着女主人公埃斯特——对20世纪50年代美国知识女性形象的分析,及对小说女性主义主题的阐发。例如 Linda Wagner 指出《钟形罩》是一部女性成长小说。<sup>①</sup>在我国,对《钟形罩》的评论,绝大多数都是从女性成长小说的角度来评论埃斯特这一人物,并结合当时的父权社会背景来评述她的压抑、困惑、绝望、抗争、叛逆、疯癫以及追寻。

本文作者也认为普拉斯的这部小说体现了一定的女性主义思想,以及对当时社会的批判。但本文拟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来进行分析,试图通过对小说中女性与自然的关系的探讨,以及对女性特质(尤其是直觉及多样性)与崇尚理性的父权社会之间冲突的分析,来更进一步地理解女性在当时美国社会受压制的状况,并说明作品中反映出的一定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 一、《钟形罩》中的自然意象

“生态女性主义的首要内容是女性与自然的认同”(金莉 477)。生态女性主义诞生于20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生态主义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基础上,生态女性主义的先驱发现了女性与自然同样受压迫的现状,指出自然与女性同属弱势的概念,且互相指涉,女性同大地一样,成为男性“播种”的被动接受者。

过去对《钟形罩》的评论所关注的或是小说中的死亡意象,如死人的头颅、尸体、僵尸、坟墓等,或重生的意象、或有关镜像的意象,或有关分裂的自我的意象,却忽略了小说中的自然意象。但事实上,通过对这些意象进行分析,我们不仅可以见出女性与自然的紧密联系,女性眼中自然的价值,也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埃斯特作为女性在父权社会所面临的困境。

《钟形罩》的场景主要是城市、郊区等,并没有对自然景物做很多直接的描写。但有关自然的意象却广泛地存在于女主人公埃斯特的叙述与描写中。玛乔瑞·帕洛夫(Marjorie Perloff)在一篇论文“西尔维娅·普拉斯诗歌中的焦虑与万物有灵观”(Angst and Animism in the Poetry of Sylvia Plath)中提到普拉斯诗歌的核心悖论在于人是死的,麻木的,不真实的,而一切非人类的事物却活跃而充满活力(110)。这也适用于普拉斯的这部小说。她常常把她观察到的事物或她的感觉比作自然界中的生物或现象,虽然这些东西往往只是人类物质世界中通常被认为是死的,无生命的。在小说开头的第一章就有不少这样的例子。比如纽约鳞次栉比高楼下的街道被比作“底部灰蒙蒙的”花岗岩峡谷(西尔维娅·普拉斯 1)<sup>②</sup>,埃斯特那些又贵又不舒服的衣服“像串起的鱼一样无精打采地挂在衣橱里”(2),多琳身上的味道像是扇贝形的香蕨叶子发出的麝香味儿(5)。当没人说话时,埃斯特把那种沉寂比作像丛林中的荒草一样又高又密(9)。而对于埃斯特自己的状况,她“觉得自己好似龙卷风眼,在一片喧嚣骚乱裹挟之下向前移动,处在中心的我却麻木不仁、了无知觉”(2-3)。小说中这类比喻比比皆是。

在埃斯特的眼中,人类世界与自然世界似乎是共通的,且并无高下之分。

埃斯特也常常将自己的思维活动比作植物或动物。比如跳舞时,埃斯特亦步亦趋,全然没有了自己的意志和意识。“我由着自己像一个风中的树一般,弓身折腰,东摇西摆”(85)。当描述脑海里出现的种种计划时,普拉斯写道“一个又一个计划在我脑子里蹦蹦跳跳,就像一群疯疯癫癫的兔子”(98),她还将自己打消滑雪的念头悄悄溜走比作“就像一只败兴而归的蚊子一样逃之夭夭”(76),将恶心呕吐的感觉比作“一波波的海浪,每个浪头过去后,留下她如一片湿漉漉的叶子……”(35)

这似乎类似于修辞中的拟人手法,但仔细推究就可以发现这与普通的拟人手法完全不同。拟人这一提法本身就隐含着对人类的尊崇及对非人类的物质及自然世界的贬抑。普拉斯所运用的比喻并不强调人,而是强调有生命的自然生物。这一手法的有意识/无意识运用不仅凸显了女性心理结构中对自然的认同,同时也是一种对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对自然的压迫的一种隐晦的反抗。

在占主导地位的男性文化中,女性作为弱者在语言与文学中常与柔弱的动物意象相关,而男性作为统治者或征服者常常以骑手或猎手自居。这在《钟形罩》中也有所反映。在埃斯特描述女人时,多处用了鸚鵡一词,显然是将女人视为一种观赏的玩物。例如,在描写多琳与莱尼时,读者透过埃斯特的眼睛看到,“他(莱尼)一个劲儿地盯着她看,就像人们盯着动物园里那只了不起的白色金刚鸚鵡,盼着它能说两句人话”(9)。在接下来的一章里,多琳和埃斯特来到莱尼·谢泼德的家中。牧场风格布置的公寓墙上悬挂着鹿角、野牛角和野兔的头部标本,“莱尼伸出大拇指,摸摸那温顺的小灰鼻子和僵硬的大耳朵”(12)。其中的隐喻十分明显:莱尼作为猎手,而女性和动物一样成为了猎物。马科是另一个例子,埃斯特离开纽约的前夜和多琳去参加一个乡村俱乐部的晚会,遇上了马科——一个憎恨女人的人。任何女人对他来说不过是“一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扑克牌中的一张而已”(84),女人“全是母狗”(85)。

然而,普拉斯心目中的自然并不是以理性所主导的父权社会所默认的遭受剥削压迫的自然。对上述“鸚鵡”之类的女人,埃斯特是持批判态度的。事实上,在《钟形罩》中,自然所具有的力量似乎大大超出人类。在真正的自然面前,如大海、雪山面前,人不过是蠕动的虫子,或是蠕动的微生物(77,130)。整本小说里,叙述自己故事的“我”——埃斯特仿佛一直是一位旁观者,评判者,体验者,她常常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假装附和他人,但其实她一直在寻求对自我的主宰,希望能够决定自己的选择,而不是消极地接受社会要求她接受的一切(Bardia 132)。在书中,她从未承认过自己真的被谁(除自己的身体和思想外)打败,仅除了一次例外:她被大海打败。那是在第十三章,她尝试在海里淹死自己。于是她停止划动,向海底深处潜去,但海水却总把她吐回阳光里,于是她知道,她被打败了。此外,第八章里,埃斯特从山顶上一路滑下来,奔向太阳,那世界的本源,她感到自己身体内有一个小小的点向太阳飞去,“我感到我的肺部充满了奔

涌而来的景色——空气、山峰、树林、人们。我想这就是所谓幸福吧。”她感到自己穿过“年复一年的双重人格、微笑、妥协，回到我自己的过去”（76）。当然，她最后以摔断左腿而告终。也许有人会认为这只是埃斯特的又一次自杀冲动。但笔者认为这并不是自杀，而应该理解为埃斯特试图在自然中借助自然的力量净化并回归自我——一个更强大的自我。“天顶上太阳明晃晃地照着，无动于衷。我真想将自己放在上面磨砺，直到自己变成圣人一般，像刀刃一样锋利而完美。”“我要起来，我要再来一次”都明确地表现了这一点（77）。与热水浴<sup>③</sup>相比，这将是更彻底的净化与回归。

《钟形罩》中埃斯特对自然的亲密与依赖还体现在其它场景中。如在纽约这个充满了高楼的“邪恶”的城市，埃斯特并不感到兴奋，房间里打不开的窗子让她感到莫名的郁闷，又如第三章，当她百无聊赖时，“她决定还是赖在床上，能赖多久就赖多久，然后到中央公园的草坪上去躺一天，要到那空旷的、池塘里有着野鸭的荒地上找一块最长的草坪”（24）。再如，埃斯特读到一篇关于无花果树的故事，她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意思，特别是描写冬雪下的无花果树以及春天到来，树上挂满绿色果实的部分。普拉斯写道：“读到最后一页时我（埃斯特）意犹未尽。我真想从这些黑色铅字的字里行间钻进去，就像人们钻过栅栏缝隙那样，在那棵美丽、苍翠的大无花果树下悠然睡去”（44）。在小说后半部分，埃斯特的康复过程无疑也体现了自然的治疗作用，无法想象埃斯特能够在一间门上窗户上装有铁栏杆的医院里康复。得到女作家菲洛梅娜·吉尼亚的资助，埃斯特得以幸运地进入一家私立医院治疗，“那里有操场、高尔夫球场和花园，就像一家乡村俱乐部”（151），窗上没有装铁栏杆，病人可以自由散步、活动。

综上所述，埃斯特虽然并没有像后来的生态女性主义者那样走得那么远，将女性与自然的命运结合在一起，建构一种新的道德价值与社会结构：“人类将最终被视为人，而不是首先是男人或女人。一个更接近于女性的地球将变得对于所有人都更加郁郁葱葱”（转引自金莉 475），《钟形罩》中借埃斯特之口所展示的自然意象形象地表现了女性与自然共通共生的感受，以及女性受男性压迫的社会现状，也同时表现了女性对自然的肯定与依赖，以及在自然中感受到的力量。

## 二、埃斯特的生命直觉及多样性理念

小说《钟形罩》里，女主人公埃斯特处于父权社会对女性身体和思想的双重约束与禁锢之中。不同于小说中众多女性的是，她并没有也不想顺从社会对她的要求。“女人只能有一种生活，必须清清白白，而男人却可以过双重生活，一种清白，一种不清白，这种想法我（埃斯特）没法接受”（64）。此外，在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尽管女性被鼓励接受高等教育，但上大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受教育以及为将来的事业打基础，大学不过是获得理想婚姻的手段。女大学生一毕业、或是在短暂的职业生涯后，往往立即结婚，似乎女性的事业与家庭婚姻不能两全。

这些都是典型的男性一元霸权思想的体现。在罩住埃斯特的巨大钟形罩中,充斥着的就是这样酸腐的空气,而她,却并不想循规蹈矩地做这些“她应该做的事”。在埃斯特精神崩溃之前,她藉以反抗这一霸权的工具之一就是她始终强调的“直觉”。

埃斯特特别钟情于直觉。她对人的好恶常常直接取决于她/他是否具有直觉。例如,她喜欢多琳,因为多琳富于直觉,她对康斯坦丁颇有好感,亦因为他有直觉。而她的家庭医生也因富有直觉而得到她的喜爱,相反,对巴迪以及戈登大夫的厌恶则都因为他们缺乏直觉。直觉是什么?现代哲学里面,使用直觉这一概念并赋予其重要内容的是柏格森。但直觉这一概念并不是柏格森的首创。柏拉图用它来指对理型的精神直观。在近代,不断有哲学家使用这个概念,大抵与作为概念思维和推理能力的理性相对,指人对事物和事态的本质,对总体关系结构的直观把握的能力。直觉是本能的产物。本能往往被认为是低级的东西,但在强调非理性的真实性与合理性的哲学家看来,理智与本能既对立又互补。如果理智是用机械的方式对待一切事物,那么本能则是用有机的方式对待事物。本能能够向我们揭示出生命最深层的秘密。传统形而上学以理智为尊,以理智来理解生命。但除了理智外,本能在生命的进化过程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柏格森认为生命进化不是线性轨迹,而是爆炸式的。生命的创造不是可预见的,而是复杂的异质的。生命创造既不是机械的,也不是有目的的,而是一个不断的自由创造的过程。生命进化要克服种种阻力,虽然,在这一过程中,理智发挥的作用似乎更大,制造工具,产生科学,等等,但理智一旦超越自然的统治,就以无生命的固体为主要对象,就将禁锢生命力的全面进化与发展。然而,这却恰恰是现代科学及父权社会的发展走向。

不过,《钟形罩》中的埃斯特却毫不甘心被理性与所谓的科学精神束缚,她对自己的生命存在着强烈体会,崇尚自由与整体观。譬如:她热爱植物学,痛恨物理与化学。植物学对她来说“极其真实”,而物理化学那些抽象化的理性科学却让她感到恶心,“大脑顿时跟死了一样”(28),“他们把一切都减缩成字母与数字,这真叫人受不了。黑板上不再有叶子的形状,放大的叶子呼吸孔洞的图形,以及叶红素、叶黄素之类令人神往的词汇,而是……哪些丑陋的、蝎子式的字母歪歪扭扭地挤在一块,难以辨认”(28)。

小说中,埃斯特的男友巴迪是医学院的高材生,擅长科学分析。他整个人生哲学就是行动,从不肯浪费时间在夏日的海滩上打瞌睡。他正是现代科学社会培养下的理性人物典型,与埃斯特谈话时,“总能自圆其说”,让埃斯特无法反驳。或然性在巴迪眼里并不存在。埃斯特既想住在城里,又想住在乡下的思维方式被认为是神经质的。而埃斯特恰恰就是“要在一个又一个互相排斥的事物之间展翅飞翔”(73)。再如巴迪对诗歌的看法。他认为诗不过是“一粒尘土”(44)而已,而埃斯特却认为“诗歌让人们铭记在心,让人们在难过、生病或失眠时独自吟哦,”“而人不过是尘土,给尘土治病并不比写诗要高明”(45)。这反映

了诗性思维与科学思维的对立。此外,巴迪,作为科学的代言人,穿着白大褂,“听诊器从白大褂的一个侧袋里露出一截来,俨然是他身体的一部分”(75)。在他劝说下,“同意为了科学的利益——不管医学院需要不需要——让医学院解剖尸体的死者家属是最多的”(74)。而埃斯特眼中看到的却是业已麻木无言的死者家属。在埃斯特的心目中,生命的体验与直觉的感受是远比科学更重要的东西。不仅如此,科学甚至是令人恐惧的:想想卢森堡夫妇坐上电椅的情形。“电流沿着人的一根根神经烧下去,将人就那么活生生烧死,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1)但问题是,似乎人人对此都无动于衷。当埃斯特以为希尔达也为卢森堡夫妇感到悲哀,并认为自己“终于在她那错综难解的心灵上触到了一根具有人味的弦”时,她却发现自己错了:“让这种人活着太可怕了。”“我真高兴他们要死了”(79)。

小说中有多处埃斯特都提到不想结婚。除了因为不想落入以下结局:“不管男人在娶到女人之前送她多少玫瑰……他私底下只盼望婚礼一结束,她就像威拉德太太的厨房地毯一样平展在他脚下,服服帖帖”(66)。还因为男人可以在外面过上“丰富多彩、激动人心的一天”,“而我呢,晚上有更多的脏盘子要洗,只弄得精疲力竭,瘫倒在床上”(66)。她最腻味的就是婚姻中对女性来说所谓“永恒的安全感”,“或者当个射箭的出发点”。她想要的是“我想要变化,想要兴奋,想要我自己往四面八方射出箭去,就像七月四日独立日的火箭射出的缤纷的礼花”(65)。埃斯特对婚姻的排斥与她对生命的热爱与直觉体验(包括做母亲生儿育女)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她想要自由清醒地拥有孩子,而不是无意识地躺在刑台般的床上,由着麻醉剂[“一听就是男人的发明”(52)]让她忘却一切。

埃斯特面临的矛盾是尽管她有着多样化的理想,也不想受任何一个人的控制(尤其是男人),这个社会却根本不允许她这么做。小说第七章形象地描写了她的困境:

我看见我的人生像小说中那棵无花果树一样,枝繁叶茂。

在每一个树枝的末梢,仿佛丰腴的紫色无花果,一个个美妙的未来向我招手,对我眨眼示意。一枚无花果是丈夫、孩子、幸福的家,另一枚是名诗人,又一枚是才学出众的教授,一枚是埃·格,了不起的大编辑,再一枚是欧洲、非洲、南美,另一枚是康斯坦丁、苏格拉底、阿提拉以及一堆姓名古怪、从事非凡职业的情人们,再一枚是奥林匹克女队冠军,在这些无花果的上上下下还有许许多多我不大辨认得出的无花果。

我看见自己坐在这棵无花果树的枝桠上,饥肠辘辘,就因为我下不了决心究竟摘取哪一枚果子。我哪个都想要,但是选择一枚就意味着失去其余所有的果子。我坐在那儿左右为难的时候,无花果开始萎缩,变黑,然后,扑通,扑通,一枚接着一枚坠落地上,落在我的脚下。(60)

埃斯特不会勉强自己仅仅为功利的目的而行事,也不愿意自己只是为了履行父权社会赋予女性的责任和义务而活。速记令她抓狂;而尽管她向往爱情,却不愿意只是为了钓个金龟婿。她追求的是直觉、诗意、丰富的生命,乐于观察世间种种不同的事物,对缺乏这一切却又自认为高高在上的男性的理性思维以及功利主义嗤之以鼻。

借助埃斯特的生命直觉和多样性观点,作者普拉斯在《钟形罩》中不自觉地批判了西方的现代理性和科学观念。现代科学观念以理性精神为基础、以征服自然为目的,其本质是父权制在科学领域的延续。男性取代自然成为宇宙的中心,理性、抽象思维等男性气质赶走了情感、直觉、依赖等女性气质,攫取了统治地位。女性与女性思维模式成为不受尊重、不受欢迎的“他者”。这种一元的妄自尊大的统治表现在生命世界与社会的多个方面,然而,生命本身是相互依存而无限多元化的,在反对任何形式的统治的同时,生态女性主义呼吁“建立一种不是基于统治原则而是基于互惠和负责原则的生态伦理观”(金莉 485),如果生态女性主义的平等原则能够得以实现,埃斯特的困境将不再成为困境。

也许我们并不能将普拉斯称为生态女性主义者,但她作为女性及诗人的双重敏感性足以帮助她在创作作品时,将自己形成的有关世界(包括自然与人类社会)与女性状况的思考投射其中。而从上面的分析看来,普拉斯所创造的这个半自传人物埃斯特显然体现了一定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埃斯特·格林伍德(Esther Greenwood)这个名字本身就提示了自然的力量。<sup>④</sup>而小说中,借助自然以及女性本身的特质(直觉、诗意、多样的可能性等等)以对抗父权社会的霸权虽然无效,却仍旧体现了女性可能具有的力量。<sup>④</sup>当然,本书中,普拉斯主要关注的是女性自身面临的问题,小说的发展及结局对这一问题本身的解答是含糊的,更不用说将女性与自然及其它所有当前社会中受压迫的存在及思想联系起来,切实提出平等互惠的原则。但,如同自然作为他者,常常在种种灾难中展示自己的伟力一样,普拉斯/埃斯特“运用一种形象化的声音,一种充满激情的声音”(Griffin 2),展现了女性作为“他者”的特质与力量,而这一力量正是《钟形罩》这本小说的核心吸引力。

### 注解【Notes】

① 见 Linda W. Wagner, "Plath's *The Bell Jar* as Female 'Bildungsroman'," *Women's Studies: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12.1-6 (1986): 55-68.

② 以下出自小说《钟形罩》的引文只注出页码。

③ 在小说第二章里(16-17),埃斯特谈到自己对热水澡的热爱:“我泡在热水中比在其它任何场合都要来得自在”,以及热水澡类似圣水,具有净化、纯净自我的功效。水本身也是源于自然的,虽然在浴缸中泡热水澡显然是文明发达后人类才有的享受。笔者在这里试图将二者(泡澡与此次滑雪)做一比较,以说明滑雪这一场景所具有的重要的净化意义。

④《钟形罩》的女主人公埃斯特姓格林伍德,译成中文即绿树林。当然,普拉斯本人的外祖母就姓格林伍德,但这一名字的选择本身已经提示了一些信息,即自然对于普拉斯的重要性。事实上,她的童年时代有一段时间是在海边度过的,大海的平静和大海的力量都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她父亲死后全家搬离海边住进靠内陆的城镇以后,包括她在后来的文学创作里,海始终是她魂牵梦绕的地方。她在题为《大洋 1212 - W》的回忆中写道:“我童年的风景不是陆地,而是陆地的边缘—大西洋的寒冷、带咸味的汹涌的丘峦。海的景象是我拥有的最清楚的东西”(转引自林玉鹏 78)。“大洋童年”是她意识的源泉。在她童年时期她就已经体会了自然的力量。

###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Badia, Janet. “*The Bell Jar and Other Prose.*”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ylvia Plath.* Ed. Jo Gil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Griffin, Susan. *Woman and Nature: The Roaring Inside Her.*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8.
- 金莉:“生态女权主义”,《西方文论关键词》,赵一凡等编。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
- [Jin Li, “Ecocriticism.” *Key Words in Western Literary Criticism.* Ed. Zhao Yifan, et al.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6. ]
- 林玉鹏:“西尔维娅·普拉斯诗中的生命意识”,《当代外国文学》1(2001): 72 - 79.
- [Lin Yupeng. “On Sylvia Plath’s Life Consciousness in Her Poetry.”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1 (2001): 72 - 79. ]
- Perloff, Marjorie. “Angst and Animism in the Poetry of Sylvia Plath.” *Critical Essays on Sylvia Plath.* Ed. Linda W. Wagner. Boston: G. K. Hall & Company, 1984. 109 - 24. ]
- 西尔维娅·普拉斯:《钟形罩》,杨靖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
- [Plath, Sylvia. *The Bell Jar.* Trans. Yang Jing. Nanjing: Yilin Press, 2007. ]

责任编辑:郭海平